

大家说历史

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

李学勤说先秦



李学勤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大家说历史

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

李学勤说先秦

李学勤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李学勤说先秦/李学勤著;宫长为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

(大家说历史)

ISBN 978 - 7 - 108 - 06181 - 2

I. ①中… II. ①李… ②宫… III. ①中国历史 - 先秦时代 - 通俗读物 IV. ①K2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7023 号

特约编辑 孙文文

责任编辑 杨柳青

封面设计 陈乃馨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梅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毫米×900 毫米 1/16 印张 28.25

字 数 316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李学勤 (1933—)，北京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文化研究，注重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学、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相结合，在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众多领域，均有卓越建树。著有《古文字学初阶》《比较考古学随笔》等。本书立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整体视角，以《百年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开宗明义，依次于总说和分说陆续展开对虞夏商周的论述，范围涵盖甲骨文、青铜器、简牍、帛书等方面。

目 录

导 论	百年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3
总 说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17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奥秘	36
	夏商周三代离我们有多远	61
	走近东周列国时代	69
分 说	炎帝、黄帝的历史统绪	79
	尧、舜、禹的历史定位	85
	禹生石纽说	94
	解读夔公盃	99
	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夏代史辨	112
	《夏小正》经传中的若干问题	122
	二里头陶器的一个奇异符号	137
	二里头青铜器的一件精美饕餮纹铜饰	142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147
	甲骨文的世界	156
	“妇好”墓与殷墟甲骨分期	167
	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	173
	四方风名	179

夷方地望	186
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	192
青铜器与商朝的西土	200
从青铜器看商周文化的关系	212
从甲骨文看商周文化的关系	217
《世俘》——武王伐纣的历史记录	227
《尝麦》——周初法律制度的重要文献	236
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	244
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	261
西周官制——卿事寮、太史寮	272
西周军制——六师、八师	278
西周土地变化之一端	286
西周商贾发展之一瞥	292
东周时期王城与成周	297
东周社会等级与阶级	303
齐管仲“参其国伍其鄙”	309
秦武王“更修《为田律》”	313
多彩的古代区域文化	319
河洛文化	322
三晋文化	323
中山文化	325
燕文化	328
齐文化	329
鲁文化	331
楚文化	333

吴文化	334
巴蜀文化	335
秦文化	337
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	341
申论《老子》的年代	353
八角廊简《文子》	354
孔子与《春秋》	356
《孙子》篇题木牍与佚文	358
长台关简《墨子》	362
《庄子·杂篇》竹简及有关问题	364
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	365
《鹖冠子》与两种帛书	367
《鬼谷子·符言》篇研究	375
长沙楚帛书通论	379
对古书的反思	384
东周历史的终结	390

附 录

附录一 虞夏商周研究的十个课题	405
附录二 甲骨学的七个课题	412
附录三 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	421
附录四 理论·材料·眼界	428
附录五 自学古文字	433
附录六 作者小传	440
附录七 论著目录	442
后记	445

导

论



20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不但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在跨入21世纪之际,我们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如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是许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文科学术界,现在都非常迫切地需要对20世纪学术发展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回顾,对21世纪的学术发展前景进行展望。为此,我想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的状况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对21世纪的古代文明研究前景做一些展望,以期能有益于学人。

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要认识现在,还要认识过去,这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实际上,社会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文化不高或没有文化的人,对古代都有一定的兴趣。许多人对评书、演义和这一类的戏都感兴趣,即是证明。许多人对历史上的过去,对于各种事物的起源,特别是对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辉煌文明的国家的古代文化更感兴趣。而在现代大潮冲击了中国之后,如何认识古代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社会上各方面的人都会接触到的一个问题。

中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古文明,有着历史绵远

的传统文化。从地理大发现以后,特别是16、17世纪之后,西方势力开始向东方发展,东方人开始接触到了西方。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与他们过去认识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西学逐渐进入中国,对中国学术界、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古代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就是人们一直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越古越好,所以三代以上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如宋代理学家常说,人心乃是牵补度日,天地亦是架漏过时。意思是说:人心已经坏了,好像一件衣服破了一样,今天打个补丁,明天打个补丁,但无论如何也总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天下世界也不如过去了,这就好比一个屋子已经漏雨了,即使你今天往屋顶上放几块瓦,明天往屋顶上堆一些白灰,但总也不能让屋子不漏雨。这是为了说明,现在的社会已不如过去的社会,人们能够取法的只是圣贤存在的那个三代时期的黄金盛世。由此可知,中国人对古代的认识问题,是一个牵扯他对于整个人生、世界的看法的最根本的问题。

因此,在中国古代,经学就成了整个学问的核心。经就是从黄金时代传下来的书。有不少中国人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还在专读经书。只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晚期,西学的兴起,时势的发展,才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废科举,成立学堂,用新的学科取代读经。因为当时如不这样,国家就不能自立,我们就无法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打交道。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对古代的认识必须有所改变。如不打破古代的偶像,就不足以打破旧的网罗,不足以立新学,不足以使人们接受世界的新知识。因此,中国人对过去、对古代的认识,伴随着戊戌变法和

康有为的著作的出现,就必然地走向解体。

康有为的著作很多,其中有两部书在当时的知识界可谓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他的学生梁启超就曾说过,读了这两部书如触雷电一般。过去人们对古代的认识主要是依靠经书而来的,而这两部书宣称,经书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孔子学说,而是新莽时刘歆伪造出来的。王莽是靠篡位爬上皇帝宝座的,在正统观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心目中是很臭的。因此把经学说成是王莽“新学”,就等于给经学戴上了一个大帽子而加以否定了。因此,这两部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古代观”的否定,是疑古思潮的开始。

疑古,就是对古代的怀疑。康有为用来取代旧偶像的学说依然披着孔教的外衣,但从政治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的学说在当时是进步的,起到了冲决网罗的作用。康有为的所谓“孔学”并非他个人独创,而是得助于当时今文经学如日中天的时势。清朝人治学非常讲究门户,他们把汉朝的学问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块。清朝乾嘉时,学者们最喜欢讲贾逵、马融、郑玄这些古文经学的代表,清中叶以后又开始提倡今文经学。从龚自珍、魏源这些进步的思想家开始,到光绪时期,四川出了一位今文经学家廖平,他站在反对古文经学的角度上,认为包括《周礼》《左传》等许多古书在内的绝大多数古文经书都是刘歆伪造的。据廖平和梁启超记载,康有为一天在广东会见廖平,两人论学,廖将上述观点讲给康听,康勃然大怒,认为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廖很不高兴地离去了。但不到半年之后,康有为不但全盘接受了廖的观点,而且比廖讲得更激进。在此不能仅从道德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廖的学说是从研究经学的角度出发

的,但康有为则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其中对自己有用的内容,其目的首先不是学术。从此之后,疑古之风越来越盛,这种风气在古代研究方面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先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的传说,时代出现得越晚,内容就越丰富,就如同民间故事一样。顾先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山鼻祖,在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妙峰山的崇拜等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把民俗学的观点运用到古史研究上,认为中国古代的传说是越来越多,越造越古,越传越复杂,所以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是历代人不断地造伪的结果。

古史辨派在当时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进步作用可概括为下述三点:

第一,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传统观念认为古代遗留下来的经书的内容万古不变,为了维护经书的尊严,就要坚持古代是黄金时代的观点。现在古史辨派指出古代有些东西并不是进步的,而且存在许多问题,这有助于冲破网罗,促进学术的发展。

第二,古史辨派对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重新审查,这和欧洲在文艺复兴后对以《圣经》为代表的文献进行审查一样,为繁荣新的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古史辨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而为建立新的古代观开辟了道路。这也正是现代考古学能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建立,并为中国人接受的根本原因。在传统观念中,中国人最痛恨“偷坟掘墓”。在传统的刑法里,对挖坟的人都要处以较重刑罚。由于疑古思潮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识和崇拜进行了大扫荡,有利于以发掘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现代考古学能传入中国。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疑古思潮所起的副作用。由于古史辨派在疑古时,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对一些本来不应怀疑、不该否定的内容也加以怀疑和否定,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说是很多的冤假错案。而如果对古书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么古代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中国古代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学术,中国也就没有什么传统文化了。如胡适就曾说“东周以上无史”。《诗经》《书经》《周易》《周礼》等都不可靠,《左传》中所讲的东西多是假的,这样一来,东周以上就没什么可信的古史了。

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他给《古史辨》第六册所写的序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可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个发展阶段,这个观点符合辩证法,受到了多数人的信赖和接受,并得到流传。信古,就是说古书中怎么说我们都相信。信古的对立面就是疑古,即对古书上说的都怀疑,都不相信,或者说主要的不相信。显而易见,没有疑古也就没有信古,也就是说,只有到了疑古思潮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传统的信古时期。冯先生还认为,只有疑古是不够的,还应对古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即对古要进行解释。如果你说古人说的不对,就要说明为什么不对,因此就需要释古,即对古要进行解释说明。

冯先生的这种说法,应该说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益的。传统的古代观是信古。由于信古,人们不易接受现代的思想观点,于是出现了疑古思潮。疑古有利于现代化的输入,可由于太过了,因此还要对古进行解释。只有对古进行科学、合理的解

释,我们才能对古代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冯先生虽然提出了“释古”这个词,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释古,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我们做出努力的大问题。这里可以说,现代考古学的成果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

有些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古代器物 and 文字的风气,因此,考古学在中国就如同古代一样古老。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正确,中国虽然至少在西周时就有人收藏古器物,汉代时就有人研究青铜器,但这并不能说明考古学在那时已经出现了,因为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是由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层位学、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构成的,它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科学工作方法,而这一套理论和方法,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五四运动后才为中国学者掌握运用。在这之前虽曾有部分外国人在中国进行过考古调查发掘,但这并不能视为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标志。

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是 1926 年由清华大学李济在山西省西南部的夏县西阴村主持的发掘。李济,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回国后到 1925 年成立的清华研究院任讲师,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共同执教。清华国学院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在国学院成立时,王国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指出历代学术史上新的潮流的产生常常是由于新发现引起的,在当时的最近二三十年有四大发现,其中甲

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论不攻自破。此后,王国维又在其讲义《古史新证》中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认识古代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这为现代考古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的发掘工作进行了15次。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也开始运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了考古发掘。但殷墟作为主要的考古工地,从1928年至今,70余年间不断做出重大贡献,其重要地位没有动摇。中国的考古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就是考古研究同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这与其他一些国家把考古研究主要与美术史、人类学及社会学的研究相结合是不相同的。有学者写文章评中国考古学,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只有打破这一点才能吸收新东西。可我个人认为,从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到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所形成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传统,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从殷墟发掘的早期开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成果,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内,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1年英国剑桥大学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的《考古学简史》出版,封面图是中国的秦俑坑。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展望中,他说今后几十年考古学的希望在中国。我认为他的这个预计是客观而科学的,因为中国的新发现层出不穷,其结果将对世界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的考古学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甚至国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的看法。我们也深信,在信古一疑古一释古的历程中,考古学不但会对史前时期、三代时期、秦汉时期的释古做出贡献,即使是对于汉唐以下的释古也会做出重大贡献。

三

要对古代进行科学的研究,仅仅有文献和考古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只要比较一下 20 世纪初出版的关于古代的书和现代谈古代的书,我们就会发现其间有太大的差别。我们现在对古代的认识之所以会同 20 世纪初对古代的认识发生根本的不同,不但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大量文献,充分利用考古学成果方面做出的重大努力分不开,而且与理论在古代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 20 世纪在古代研究的理论方面有哪些工作和发展。

只有把理论和材料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加深对古代的认识。直到 20 世纪初期西学输入中国之后,中国才有人写一些诸如历史研究法之类的文章,主要是从日本把在日本最有影响的德国兰克学派等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来。这对狭义的中国古代史,即汉以前的古代中国的研究的影响并不大。包括梁启超等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书籍,大也都只是对外国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一些介绍和发挥。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研究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